

萨都刺上京纪实诗研究

贾亦实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亚洲地域研究科

DOI:10.32629/er.v9i6.7133

[摘要] 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催生了规模庞大的上京纪行诗创作群体，这一现象成为元代多民族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萨都刺作为元代代表性色目诗人，其《上京即事》组诗以扈从巡幸的亲身经历见闻为基础，形成了兼具文学审美与历史纪实价值的上京纪实诗作品。现有研究对该组诗的关注多停留在艺术风格层面，未能充分挖掘其制度内涵与文化价值。本文以该组诗文本为核心，结合元代典章制度与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其纪实属性，分析其中蕴含的元代宫廷政治制度、游牧民族传统习俗，揭示色目诗人双重视角下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特征，验证其以诗证史的史料价值。研究表明，该组诗突破了传统宫词的书写边界，实现了文学审美与历史纪实的有机统一，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个体样本。

[关键词] 萨都刺；上京纪实诗；两都巡幸；以诗证史；多民族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Sadula's Documentary Poems about Shangjing

Yishi Jia

Graduate School of Asian Area Studies, Daito Bunk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ystem of imperial tours between the two capitals in the Yuan Dynasty fostered a large number of poets composing travel poems about Shangjing, which served as a vital carrier for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in that era. As a prominent Semu poet of the Yuan Dynasty, Sadula composed his poetic suite Occasions in Shangjing 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accompanying the imperial procession. These works feature both literary aesthetic valu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ary value. Current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ir artistic styles, while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and cultural values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Centering on the poetic texts and combining the institutions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ir documentary nature. It explores the imperial political systems and nomadic traditions reflected in the poems, and reveals the features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a Semu poet, as well as verifying their historical value of using poetry to corroborate histor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se poems break the writing limits of traditional palace poems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offering a valuable individual sample for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Sadula; documentary poems about Shangjing; imperial tours between the two capitals; using poetry to corroborate history;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1 研究背景

为了兼顾中原农耕地区与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治理，元代形成了以大都为首都、上都为陪都的两都体系，并确立了每年夏季皇帝率百官扈从巡幸上都的两都巡幸制度。元朝建立后，上都逐渐成为元代皇帝处理朝政、接见宗王与外国使节的夏季政治中心^[1]。

两都巡幸制度有着明确的时间规范：四月出发、九月返回，这一制度持续近百年，是元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上都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核心场所：来自蒙古草原的宗王、来自中原的汉族官员、来自西域的色目精英、来自藏地的宗教人士，都汇聚于此，

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生态^[2]。

在这一背景下，扈从皇帝巡幸的文人群体，以亲历的草原风光、宫廷生活、政治活动为内容，创作了大量的上京纪行诗，形成了元代诗坛独特的创作现象。据统计，元代上京纪行诗的总数接近千首，涉及诗人近60位，成为元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3]。这些诗歌不仅是文学作品，更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正史中语焉不详的宫廷日常、民族习俗与文化互动，具备重要的史料价值。正如李军所指出的，这类诗作能够以诗证史，补正史之缺，为还原元代历史提供细节化记录^[1]。

萨都刺作为元代著名的色目诗人，于元统元年，即1333

年任应奉翰林文字，拥有扈从皇帝巡幸上都的资格，其本人曾在诗作中记录了扈从巡幸的亲身经历，印证了其亲历上都宫廷生活的事实。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上京即事》（又称《上京杂咏五首》）组诗，以纪实的笔法记录了上都的宫廷生活与政治活动，成为上京纪行诗中代表性的作品。与其他诗人的上京纪行诗相比，萨都刺的作品更聚焦于宫廷制度与民族文化的细节，具备更强的纪实属性，是研究元代上京宫廷生活的重要史料。

2 研究现状

现有关于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已形成丰富成果，研究脉络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以文献整理为主，完成了相关诗作的校注梳理，确认了这一创作类别的独立价值；中期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其文献价值与艺术特征，指出其补正史之缺的作用；近年来，多民族文化融合成为研究热点，相关成果揭示了诗作中多元文化互动的特征。

针对萨都刺的研究，现有成果呈现出“二元割裂”的特征：一方面，宏观上京纪行诗研究多将萨都刺的作品作为整体样本的一部分，未能深入展开个体分析；另一方面，个体研究多集中于其宫词的艺术风格、文献考证等层面，未能充分挖掘其上京纪实诗的制度内涵与文化价值。如龚世俊等（2005）分析了萨都刺宫词的艺术风格，但未对其上京纪实诗的制度内容深入解读^[4]。刘嘉伟（2016）的研究综述中，也未对该组诗的独特价值专门梳理^[5]。

3 萨都刺上京纪实诗

萨都刺的上京纪实诗以《上京即事》组诗为核心，这是他扈从巡幸上都期间创作的五首绝句，完整记录了他在上都的所见所闻，其完整文本如下：

其一：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阑斜路来。

其二：沙苑棕毛百尺楼，天风摇曳锦绒钩。内家宴罢无人到，面面珠帘夜不收。

其三：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花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

其四：祭天马洒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其五：上京六月凉如水，酒渴天厨更赐冰。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

这组诗以白描手法，从草原都城景观到宫廷宴饮、礼仪、祭祀活动，形成了完整的纪实记录，相较于传统纪行诗，更聚焦于宫廷制度与民族文化细节，具备鲜明的亲历特征。

除此之外，萨都刺还创作了相关诗作记录扈从见闻，如“门外日高晴不得，满城湿露似江南”，记录了上都的气候特征，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其上京纪实创作的整体。

4 萨都刺上京纪实诗的制度内涵与纪实属性

4.1 扈从经历与一手纪实属性

萨都刺的上京纪实诗并非传闻或想象之作，而是其作为扈从朝臣的一手见闻。其担任的应奉翰林文字一职，职责为侍从皇帝、参与宫廷文书与礼仪事务，使其得以深入宫廷内部，记录下其他诗人无法观察到的细节，为纪实性创作提供了基础。

4.2 宫廷政治礼仪的制度还原

萨都刺的上京纪实诗，以文学的笔法，还原了元代宫廷政治礼仪的具体细节，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疏略。

首先是两宫祝寿礼仪。组诗中“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一句，记录了元代特有的两宫政治场景。元代由于蒙古的幼子继承制与太后干政的传统，多次出现帝后共同临朝接受朝贺的情况，形成了独特的“两宫政治”格局。元统元年，元顺帝初即位，皇太后卜答失里临朝称制，掌握实权。

据《元史后妃传》记载，元代的皇太后往往会在兴圣殿接受百官的朝贺，而皇帝则会率领诸王百官为其祝寿^[6]。萨都刺的诗则记录了这一场景的细节：诸王百官向两宫祝寿，以蒲萄酒为寿礼。蒲萄酒是西域特产，也是蒙古民族喜爱的饮品，以此祝寿，既符合蒙古饮酒习俗，也体现了两宫政治的特殊格局。这一正史未载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元代两宫祝寿的真实场景。

4.3 游牧传统习俗的文学记录

组诗中还记录了大量蒙古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与礼仪，这是以往唐宋诗词中从未出现过的内容，也是萨都刺上京纪实诗的独特价值所在。

其一，祭天仪式的记录。“祭天马洒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一句，记录了蒙古传统的祭天仪式。祭天是蒙古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礼仪，每年皇帝都会在上都举行该仪式，祈求草原平安与部落兴盛。与汉族在南郊圜丘举行的繁琐祭天仪式不同，蒙古祭天保留了游牧特色，在草原上以马酒为祭品祭祀天地。

诗中“白马如云向西北”一句，更体现了蒙古文化传统：蒙古人认为白马是神圣动物，西北是蒙古民族的起源地，因此祭天时，白马需朝向西北，表达对祖先的敬意。祭天之后，皇帝会将马酒、紫驼、银瓮等赏赐给诸王，这是蒙古传统赏赐制度的体现，通过赏赐维系皇帝与宗王的关系，巩固部落团结。萨都刺的诗将这一宏大礼仪场景，转化为草原特色的文学描写，生动展现了蒙古传统礼仪的特征。

其二，质孙宴的场景还原。“沙苑棕毛百尺楼，天风摇曳锦绒钩”与“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花帽宴亲王”两句，共同还原了元代最重要的质孙宴（诈马宴）的场景。棕毛百尺楼，即失刺斡耳朵，蒙古的棕毛殿，这是用棕毛搭建的帐殿，为游牧民族特色建筑，专门用于举行质孙宴^[7]。质孙宴是元代上都巡幸期间的核心政治宴享制度，大宴之上，与会宗王、大臣、近侍需身着统一颜色的质孙服，蒙古语“质孙”

意为“一色”，因此质孙宴也被称为“一色宴”^[6]。

质孙宴绝非普通宴饮，而是皇帝与宗王贵族议事、赏赐，维系草原政治传统的核心场合。宴间与会者需每日更换不同颜色的质孙服，诗中“朱衣花帽”正是其中一日统一服饰的生动写照。这一描写弥补了正史对质孙宴日常场景记载的疏略，让我们得以直观看到这一蒙古旧制在宫廷中的实际运作。

5 萨都刺上京纪实诗中的多民族文化融合

5.1 色目诗人的双重观察视角

作为色目诗人，萨都刺拥有独特的双重身份：他既精通汉文化，熟练掌握汉地的诗体与书写传统，能够运用汉地的宫词形式进行创作；又因色目身份，对蒙古的制度与文化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与认同。这一双重身份，使得他的上京纪实诗，既不同于汉族诗人对蒙古文化的“他者”观察，也不同于蒙古诗人对汉地诗体的初步尝试，而是形成了融合两种文化的独特视角。

这种双重视角的独特性，在与同时代诗人的对比中尤为明显：南方汉族诗人的上京纪行诗多流露羁旅乡愁，将草原视为异域，强调其与江南的差异；而萨都刺则能以融合的视角看待不同文化，将草原风物与江南记忆结合，如“门外日高晴不得，满城湿露似江南”，便体现了这种独特的文化感知。同时，与杨维桢等汉族诗人追和宫词时仍聚焦后宫闲情不同，萨都刺的创作跳出了传统宫词的边界，将宫廷制度与政治活动纳入书写。

5.2 多元文化元素的融合

萨都刺的上京纪实诗，集中展现了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其中包含了蒙古游牧文化、汉地宫廷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多元元素，这些元素在诗中实现了有机的融合。

首先是蒙汉文化的融合。组诗中，既有蒙古的棕毛殿、质孙宴、祭天仪式等游牧文化元素，也有汉地的宫词诗体、宫廷礼仪等汉文化元素。例如，上都的宫廷生活，既保留了游牧民族的宽松氛围，“内家宴罢无人到，面面珠帘夜不收”，没有大都宫廷的严格宫禁；同时，又融入了汉地的宫廷建筑与礼仪制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还有赐冰制度与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汉地传统制度与宗教因素被元代引入草原宫廷，“酒渴天厨更赐冰”同“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正是这一融合的体现。

这一记录更修正了学界的传统认知：以往观点认为十六天魔舞是元顺帝晚期出现的享乐舞蹈，甚至被视为怠政亡国的标志，但萨都刺的记录证明，这一舞蹈早在元代中期就已传入宫廷，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澄清了后世对其的污名化解读。

此外，诗中以葡萄酒为寿礼的细节，也体现了西域文化在宫廷的传播，这些多元元素共同构成了元代宫廷的文化生态，而萨都刺的诗正是这一生态的真实记录。

5.3 以诗证史的史料补正价值

萨都刺的上京纪实诗，具备重要的以诗证史的价值，能够补正史籍记载的不足。元代官修《元史》修史仓促，因此对宫廷日常、民族习俗的细节记载多有疏略，很多重要的制度与文化细节都未得到详细记录。而萨都刺的亲历记录，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憾，为我们还原元代的真实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除了前文提到的制度细节还原与史料补正之外，他的诗还记录了上都的气候等细节，如“上京六月凉如水”，还原了上都夏季凉爽的避暑特征，这些正史未载的细节，为我们还原元代上都的自然环境提供了重要参考。

6 结语

萨都刺的上京纪实诗，作为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代表性个体作品，突破了传统宫词的书写边界，将宫廷政治制度、民族习俗等严肃的内容纳入宫词的书写范围，推动了宫词从闺阁闲情向制度纪实的功能拓展。其诗作以清新白描的手法营造出清丽的诗歌意境，具备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另一方面，他的描写符合元代的宫廷制度，相关细节可与正史记载形成互证，实现了文学创作与历史纪实的有效结合，以诗证史，补正了正史的记载。

它以色目诗人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为研究元代的民族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样本。他既精通汉地的诗体传统，又深入理解蒙古的制度文化，将多元的文化元素融合在诗歌之中，展现了元代大一统王朝的文化风貌。

萨都刺的上京纪实诗，不仅是元代诗歌的重要成果，更是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其独特的价值，为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与多民族文化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李军.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J].民族文学研究,2008(1):97-102.
- [2]梁俊仙.《冀西北民族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评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6):116-117.
- [3]刘素琴,王小梅.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9-13.
- [4]龚世俊,臧于厚.试论萨都刺的宫词与艳情诗[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52-55.
- [5]刘嘉伟.萨都刺研究综述(1949-2015)[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18(6):552-560.
- [6]宋濂等.元史[M].中华书局,1976.

作者简介:

贾亦实(1994.07-),男,汉族,河北省南官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元代色目人汉诗。